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 京 出 版 社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207,000字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书号: 11071·202 定价: 1.20元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十一辑

目

录

走出书斋 投身救国

——回忆“一二·九”运动的火热年代……………邓力群（1）

周总理同先父朱启钤之间的交往……………朱海北（15）

采访军调部新闻杂记……………陈维麟（25）

先师孔伯华先生……………马龙伯遗稿（33）

忆先师施今墨先生办学……………翟济生（50）

让中医插上科学的翅膀

——父亲郭士魁大夫呕心沥血的一生

……………郭维森 刘烈和（65）

戏曲艺术家李桂云……………王登山（80）

我的壁画生活……………陆鸿年（154）

从金台书院到东晓市小学……………陈德光（170）

记同泽新民储才馆……………李荫春（180）

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始末	姜明文 (195)
北京陆军军医学校	沙林芳 (208)
清河陆军预备学校散记	刘万春 (214)
马汉三之死的前前后后	华 清 (220)
大特务马汉三之死	文 强 (235)
大有油盐粮店	孟瑛玺 (252)
月盛斋马家老铺	马 霖 (261)
漫话青山居玉器市	李启元 陈德光 (271)
旧北京的黑猴儿帽店	李建平 (278)
我所知道的公主坟	林 勤 (287)
集灵囿	苏亚民 (289)
来函照登	(295)

走出书斋 投身救国

——回忆“一二·九”运动的火热年代

邓 力 群

一九三五年底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是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前奏。当时的北平，在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许多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毅然放弃了舒适的书斋生活，投身到救亡运动的洪流中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实现了由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是通过“一二·九”运动的战斗洗礼走上革命道路的。这一段历史的时间短暂，而且过去快五十年了，但我每一忆及，都长时间地激动不已。

走 出 了 书 斋

“一二·九”运动时，我二十岁，正在北平私立汇文中学（校址在崇文门内船板胡同，解放后改名为北京市第二十六中）高三理科甲班读书，当时的名字叫邓声喆。汇文当时有学生约七八百人，其中有三百来人是住校生，其余都是走读生。我是住校生，住在西楼的三层楼上。记得那时西楼是栋四层楼的楼房，“文革”

前我去看时，不知为何成了两层楼的楼房了。

“一二·九”当天，汇文中学有个别同学参加了游行，但没有组成一支游行队伍。我在事前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十二月九日我们在学生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才听说白天许多学生上街游行了，军警打伤了几十名游行示威的学生。同学们议论纷纷，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学生爱国有什么罪？大家对国民党当局派军警镇压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表示非常愤慨。

大约在第二天上午，燕京大学的三四个学生到汇文来了。我们高三理科的学生正在地下室听张老师讲物理，就听学校的大钟“咣咣咣、咣咣咣”地响得很厉害，同时有人喊：“到体育馆开会！到体育馆开会！”于是各班同学就涌到体育馆去了。在体育馆，燕京大学的同学站在凳子上向大家发表演说：昨天十二月九日，北大、清华和燕京大学的学生，还有其他大中学校的学生，已经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暴行，受到警察的迫害和镇压，希望得到同学们的支援。现在燕大和参加游行的学校已经罢课了，希望爱国的同学们参加到罢课的行列里来！他们每个人讲了几分钟，慷慨陈词，痛哭流涕。会场的情绪非常激昂。汇文有同学提出：“我们也参加爱国运动，从今天起罢课。”同学们当即一致作出罢课的决议。大会通过表决，成立非常时期学生会，领导本校爱国救亡运动。被提名为非常时期学生会委员的，有高三文科的李长楫，有我，还有柯德声、曹正之等三个同学，一共五个人。为什么把我选为非常时期学生会委员呢？这是因为，一方面我的年级高，在高三理科甲班，功课也不错，受到老师和同学的重视；另一方面，从一九三三年以后，在我周围团结了若干进步的同学，形成一个没有名称、自愿参加、阅读革命书刊的小组。

其中有钟国元、白树荣、罗邦英，另外还有几个人，我们常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因此，在大会上，钟国元一提名，我就被大家选为汇文中学非常时期学生会的委员了。大会以后，我们非常时期学生会五个委员在一起开了个会，讨论分工和以后的工作，大家又推我为会长，李长楫为副会长。

说起我们那个没有名称的阅读革命书刊小组，还需要讲讲我的表哥扶屏。我是一九三一年来北平进入汇文中学念初中二年级的。当时，扶屏在冯玉祥创办的北平今是中学教书，是个革命青年。他常借一些进步书刊给我看，记得有鲁迅、茅盾、郭沫若的作品；有苏联的小说，如《铁甲列车》等；还有社会科学书籍，如河上肇的《唯物史观研究》等。“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国民党统治集团节节退让的情况下，我对国民党日益感到失望和憎恶；经过阅读进步书刊，我对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钦敬之情。有一次，扶屏问我：“你要不要参加什么组织？”我表示愿意参加。他说：“过些时候我找人和你谈谈。”但是，过了不几天，他在东安市场一带撒传单，被当场抓走了。后来，他被关在草岚子监狱，我每个月去探望他一次，带点钱和日用品去给他。每次走到监狱大墙下，看到阴森森的岗楼和铁丝网，听到犯人们脚镣手铐的叮当声，就增加一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憎恨，提高一分对共产党人的同情和尊敬。这大概可以算是我追求革命的萌动时期吧。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说“一二·九”时期的情况。汇文中学成立非常时期学生会以后，首先要组织自己的纠察队，维持罢课期间的秩序，防止国民党特务钻进学校搞破坏，防止他们侦察爱国积极分子的活动和逮捕学生，镇压学生运动。大家选举边燮朴（现

名李文，任水电部办公厅主任）当纠察队长。他喜欢武术，周围有一批爱练武术的同学。纠察队基本上就由他们这些同学组成。他们的任务除把守大门外，也搞些交通联络等活动。

汇文大多数同学是走读生。罢课以后，走读生很少来校了。住校生住在西楼和北楼两个宿舍，大家天天聚在一起议论国事，书也读不下去了，情绪很热烈。

上 大 街 游 行

汇文从“一二·九”的第二天——十二月十日起罢课。过了一两天，由清华、北大、燕京各校参加学生运动的骨干组成的北平学联，就跟汇文非常时期学生会取得了联系，并秘密通知我们：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逮捕和镇压学生，汇文要准备参加第二次大游行。我们按照这一通知，在学校进行了宣传鼓动工作。又过了一两天，学联正式通知说，定于十二月十六日举行第二次大规模游行。我们学生会的几个负责人和积极分子，分头做了组织发动和其他准备工作。

十二月十六日早饭后，在汇文二楼靠东边大教室开动员会，三百多同学参加了。首先由我做动员报告，宣布学联通知的游行时间和目的，鼓动汇文同学一起担负起爱国救亡的责任，然后请大家讨论是否参加游行。我热泪盈眶地讲了约半小时。话音刚落，几个积极分子立即响应说：“一定参加，我们到会的同学都参加。”洪朝生同学（现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讲话人之一。几个人都讲得慷慨激昂、义愤填膺。会场上群情振奋，一致同意参加这次游行。会后大家聚集到楼下整队。整队的时候，北风呼啸，寒气逼人，但我们一个个热血沸腾，决心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挽

救祖国的危亡。我们非常时期学生会的几个负责人，我、李长楫、柯德声、曹正之等排在队伍的最前头，四个人一排，臂挽着臂，高呼着口号，出校门往南沿城墙往西走。队伍走到慕贞女中墙外，大门紧闭。我们喊了一阵，希望他们罢课，也冲出校门和我们一道参加游行。但没有回响。我们继续前进，一路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口号。压抑了很长时间的爱国热情，终于在街上爆发了。我们这支三百来人的队伍，象一股铁流，奔腾向前。我们深深感到：团结就是力量。这不但使同学们热情奔放，热泪直流，而且引起了路上的市民、行人、商人的注目和同情。这一路上，还没有受到宪警的干涉。游行队伍预定在和平门外师范大学汇合。我们的队伍出崇文门，经磁器口往西，过珠市口，往西再往北，到和平门大街路口上，被警察、宪兵及保安队一百多人挡住了，不许过去。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爱国，我们要抗日！”“希望你们也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警察没有动手。宪兵大部分是东北人，持中立态度，也没有动手。最坏的是保安队。他们身背步枪，手拿大刀，全副武装。队伍想冲过去，他们不让冲。相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一声呐喊：“冲！”保安队就拔出大刀，用刀背砍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警察一看保安队动手，也跟着用皮带抽打我们，这一来就把我们的队伍打散了。保安队是宋哲元的部队，平常在街上看不见他们，有事才出来。他们没开枪。可能他们内部有命令，只用刀背砍。那时是冬天，我们穿着棉衣，但刀背砍也很痛。有的同学受了些轻伤。那天没有抓我们的人。队伍被打散了，一部分汇文同学就跑到了师大对面的师大男附中。

师大男附中本来关着大门，还在上课。我们一下子冲进去一百多学生，师大男附中的同学们纷纷说：“人家为了救国上街游行，都挨打受伤了，我们还有心思上课？”他们的课上不下去了。师大男附中的同学和汇文的同学一同到操场上开了个大会。我在会上讲了话。当时在师大男附中女生班念初中的王光美同志解放后和我说，她还记得那天在操场上讲话的情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当局镇压爱国学生的行为，使在场的同学们同仇敌忾，愤怒无比。师大男附中的同学也都义愤填膺地向我们表示：“从今天起参加爱国运动，一起罢课，和你们手拉手一起救国，一起抗日。”到了下午四点钟左右，我和两个同学从师大男附中出来，又去找游行队伍。听说有几个大学、中学在前门箭楼汇合。我们走到前门，队伍也散了。那时街上到处是警察，走了一两处，也都被打散了。天黑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只好回学校去。

去学联开会

一两天后，学联秘密通知我，让汇文派人参加学联的会议，交流“一二·一六”游行情况，总结这次游行的经验教训。一天晚上天黑的时候，我到达燕京大学，有人引我去一个楼顶上不太高的阁楼。那里没有桌子，没有椅子，到会的人就坐在地板上。一个学校挨着一个学校，汇报那天游行队伍的组织、游行经过、受到镇压的情况等等，并总结这次示威游行成功的地方是什么，经验教训是什么。当时我提了一条意见，说只通知我们游行，没告诉路线，也没讲清楚最后到哪里汇合，上街以后又没人和我们联系等等。我讲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游行的人很多，但没有很好地组织，以致各校学生的力量没有能够更大规模地汇合起来，

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时学联接受了这条意见。

主持会的是女一中的郭明秋（后来她成为林枫同志的爱人）。她的身份是学联主席。开会的时候，她常常回过头去跟后面的人商量，再向大家讲。后来才知道，在后边出主意的就是姚依林同志。当时还有黄敬，还有中国大学的董毓华。董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病逝。在这次会上，大家相互认识了。最后，郭明秋让大家回去把现有的力量组织好，巩固下来，然后继续做好宣传鼓动工作，争取更多的同学、更多的人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

南下宣传团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学联通知，要求各校在罢课的同学中组织一部分人参加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学校进行救亡活动。为什么要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呢？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单枪匹马地搞救亡运动是不够的，还必须把爱国救亡运动深入一步，推进到工农中去，和工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革命的队伍无比地壮大和发展。南下扩大宣传，就是革命知识青年深入华北农村，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实行学生和农民的结合。汇文的同学经过动员，报名参加南下宣传团的有五人。这五个人中有我、钟国元、侯晓澜，另外两个同学的名字我忘记了。李长楫留在学校做救亡工作。名单报上去以后，学联让我们尽量向学校要点经费，除去自己吃，还要准备点宣传费。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说，汇文校长高凤山及学校主管经费的人还算开明，从学生会会费中支了一百多元，让我们打了一个借条。这笔钱，给每个人买了一顶风帽，其余的大部分都捐赠给南下扩大宣传团团部了。

一月初的一天，学联通知我们五个人去农业大学（现在的约

鱼台附近)集合,时间在黄昏。后来我们知道,南下扩大宣传团共分四个团,有五百来名成员,他们大都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但当时我们只知道北平有两个团(实际上有三个团),汇文几个同学编在第二团一个分队。这个分队有镜湖中学、汇文中学,还有女二中,一共十几个人。天黑了以后,我们就从农大出发,经过丰台、高碑店连夜行军,第一站到了一个地方,地名忘记了。后来继续前进,就到了永定河南岸的固安县。一、二团在这里会合了。本来想进城去。县长和县警察局得知学生来了的消息,把四门紧闭,不让进去。两个团只得在西城门外一个大车店里住下。一路上,我们忍冻受饿,十分疲倦,真想马上美美地睡它一天。但是,我们克服了疲倦和困意,一到这里就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讲了宣传团的目的是什么,口号是什么,我们是办什么的,等等。讲毕,擅长唱歌的同学就站在板凳上,挥手打拍子,教大家齐唱救亡歌曲:

工农兵学商,
一齐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
走出工厂田庄课堂,
到前线去吧!
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记得在这个会上,曾经发生过一起争论。学联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人出来反对,提出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理由是中国受许多帝国主义侵略,不只一个日本。于是就展开了讨

论。会上参加讨论的同学，虽然水平有高有低，但大家感受最深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且又迫在眉睫，所以绝大多数爱国青年赞成前一个口号，反对后一个口号。后来才知道，主张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是受了托派的影响。

天津的南下扩大宣传团，也在固安跟北平的三个团会合了。我们在固安住了好几天。接着，四个宣传团改组为三个团，并决定三个团分为三路南下。我们这一路从固安出发往新城走。走到一个庄子，住在这庄子的小学校里。这时，北平保安队的两部大汽车，装着便衣警察，追赶上来，把这个团包围在小学校了。时间是在一月中旬某一天的下午五点左右。保安队命令学生集合起来，一个一个搜身，进行检查。搜出小刀、宣传品等全部没收。他们不让队伍再往前走，说第二天一早，要由他们押送回北平。大家非常气愤。保安队只守住学校大门，后边有个小门，没人看守，被团的领导、中国大学的董毓华和东北大学的同学发现了。半夜十一二点，我们悄悄地从后门出来，一个也没有被他们抓住。我们接着就向任邱行军。深更半夜，路又不熟，深一脚浅一脚，队伍就不整齐了。但是走到任邱，汇文几个人并没有走散。

参 加 民 先 队

一路行军、做工作，是对每一个青年学生的考验。团里有的人早已入党，就找党外的几个同学谈话。他们一个是孙敬文（原化工部长），一个是徐化一，前者是镜湖中学的，后者是成城中学的。他们在路上除去和我谈，还和钟国元谈，也和别人谈。谈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加入组织。我直接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或共青团。徐化一他们经过研究，让我们先参加民族武装自卫会。

汇文中学这五个人走到高碑店，有两个就害怕了，边哭边说，老是走，走到哪儿去？也找不到家了……这两个同学从高碑店回校了。

我和钟国元等三个人在去任邱的路上，又和孙敬文、徐化一、王雁秋（他是成城中学的，解放后曾任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等人走散了。到了任邱，找不到孙、徐等人了。我们汇文这几个人刚刚参加民族武装自卫会，找不到介绍人了，很着急。估计他们可能回北平了，我们就从任邱回到北平。回来以后才知道，他们没去任邱，而直接到了保定，其他人也陆续到了保定。一、二两个团在保定又重新汇合。在保定会师的会上，确定组织一个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南下扩大宣传团的这批进步青年为骨干。会后，一致同意不往前走了，都回北平了。当时北平市委和北方局领导的意见，是让学联扩大自己的力量。

我们汇文几个同学回到北平不几天，徐化一等人就来找我们说：“怎么找不到你们了？”我们说：“我们就是回来找你们啊！”他们告诉我们：保定那个会上确定以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成员为骨干，做为第一批民先队员，汇文几个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成员，都可加入民先队，组成汇文民先分队。我们参加了民先队，我被选为分队长。开始发展了一两个民先队员，后来民先队员增加到十几个人。白树荣（现名白光弢，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罗邦英、余焕塘、钟国元、郭鸿志、李超（原名吕潮，原冶金部副部长）、小侯等都加入了民先队。汇文的民先队员最多时达到二十来人。

学 联 的 活 动

学联本来以燕京大学为据点，进行活动。到了一月底二月初，

学校还没开学，宋哲元在北平几个大学进行大逮捕，学联在燕京大学活动很是困难，就把办公的地点移到了汇文中学。这是因为汇文有进步学生和民先组织，组织比较严密，还有纠察队，比较安全。汇文又是教会学校，有美国人的背景，国民党在这里活动有顾虑，怕外国人说话。学联开始是在汇文西楼的地下室里面办公。姚依林每天来，黄敬隔一两天来一次。他们起草宣言、通知等，就由汇文同学帮助刻蜡版、印刷，然后由“交通”送出去。他们经常和其他学校的同学见面，进行秘密活动。搞了一段时间，姚依林和黄敬的工作调动了，又由黄华来主持学联的工作。黄华原名王汝梅，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这中间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曲折：有一天，姚依林他们在地下室活动时，来了一个不明身份的人，鬼鬼祟祟地在那里东张西望。估计可能被警察发现了，于是及时转移到了汇文的东楼地下室，又活动了一段时间。这时，姚已调去天津，黄敬也不做群众工作，专门去做党的工作了。这样，学联的工作就全落到了黄华的肩上。

汇文这时成为学联执委之一，由我代表参加。当时学联执委有燕京、清华、华北大学等。黄华主持学联工作时，正遇上宋哲元开始逮捕各校学生，汇文也慢慢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以后黄华主持学联开会，接头地点就不固定在汇文，而是打游击，一会儿在燕京，一会儿在华北大学，一会儿又在别的学校，没有一定的地点了。

我这时一方面在学联执委会工作，一方面做民先的工作，两方面都管着。这时北平市委指示：罢课不能无限期延续下去，这样会脱离学生，脱离家庭，孤立自己，要宣布停止罢课，复课。汇文复课后，就正式选举学生会，非常时期学生会已经完成了它

的历史使命。重新选举学生会，还是把我选进学生会，当了会长。李长楫也被选进了学生会。

郭清追悼会

到了一九三六年二三月，国民党当局公然下令解散学联，而且到处抓人，制造白色恐怖。进步分子不愿忍受，一定要反抗。黄华一接手学联的工作，就遇到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是国民党的镇压、破坏；另一方面是我们这样一些初出茅庐的同志，热情很高，要同反动派拼，不愿忍受。每次开会我们就吵，要求游行。恰巧不久，一九三六年三月九日，被抓的十七中学生郭清惨死在国民党监狱里了。这件事在进步青年学生中引起极大愤怒，也引起了急躁情绪，要求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黄华比我大两岁，特别市委彭真同志他们，有经验，认为不能硬冲，不能冒失。每次开会，黄都想要说服我们：工作要踏实点、忍耐点，力量再大点，不要硬拼。但每次都说服不了我们。一开会，我们几个人都怒火中烧，慷慨激昂大讲一通。我是一个，华北大学也有一个，当然另外还有一些人，但是以我和华北大学那个人最积极。郭清的事一出来，更忍不住了。我们实际上是把进步分子的情绪说成是群众的情绪，认为不但我们要反抗，一般学生都要反抗，只要一命令、一号召，一定有很多人跟上来。争了好多次，最后黄华被我们说服了，但是说要问问上面。后来上面也同意举行郭清追悼会和游行。

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北大三院举行了郭清的追悼会。有几位教授也参加了，并且讲了话。汇文的民先队员，全市一千多民先队员和积极分子都到会了，但是一般群众参加的没有多

少。追悼会上有人临时动议抬棺游行。大家都赞成，很容易就通过了。在北大三院东门，警察架着机关枪。我们从后边一个小门冲出去，一下子就到了南池子。往前走，有大批警察堵着，后边的警察也赶上来追，把这一千多人围得死死的，一下子抓了四十二个人。黄华同志被抓去了，汇文的罗邦英，参加这次活动的张申府教授，也都被抓去了。

后来，听说少奇同志来到北平，批评这次抬棺游行是冒险行为，是“左”倾盲动。由于这次盲动，一千多民先队员和积极分子几乎全部暴露，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这次事件对我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训，从这以后，我比较有耐心了，工作也比以前踏实了。

入团并转党

到二月底，我在汇文呆不下去了。我住在西楼宿舍，四个人一屋。有一天，同屋同学告诉我：忽然来了一个人打听你，看样子不象是你的亲戚朋友，也不是一般学生的打扮。他们劝我换个地方。我就从汇文宿舍搬出来，到西城一个公寓，和徐化一住在一起。

我当民先分队长时间不长，东城区各分队组织民先区队部，总队部指定让我去当区队长。汇文的分队长由白树荣接替。我同徐化一住在一起时，进一步向徐提出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的要求。不久，经过上面的批准，在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间，我参加了共青团。我还从汇文民先队员中介绍白树荣、罗邦英、余焕塘、李超、钟国元等入团。开始我是汇文团支部的书记。我走了以后，由白树荣任书记。那时汇文共青团员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一九